

长时段^①的回归

[美] 大卫·阿米蒂奇、[美] 乔·古尔第 王晗译**

摘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致力于自然时间跨度在5年到50年之间的研究。这种关注点的聚焦表明历史学家放弃了他们在20世纪后期之前普遍关注的更长时间段,造成了长时段与广大读者的隔阂,也使它失去了在公共政策和全球治理方面曾起到的作用。本文调查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所造成的结果,并针对它所造成的信心及其他相关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当前,回归到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经典定义“长时段”是紧要且可行的:紧要性在于恢复历史学科作为重要社会科学的地位,而可行性在于我们可以获得大量历史数据及分析它们所必要的数字工具。

关键词 长时段、布罗代尔、年鉴学派、史学史、数字历史、微观史学、大历史

正是对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大历史。

—— [法] 埃蒙德·法拉尔, 1942年^③

① 在此特别感谢 Matt Desmond, Paul Freedman, Daniel Jütte, Jeremy Kessler, Antoine Lilti, John Witt 以及耶鲁法学院法律史论坛的其他参与者对这篇文章较早版本的评论。

** 作者简介: 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系主任; 乔·古尔第 (Jo Guldi),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简介: 王晗,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陈志坚审校。

③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xiv, 引于前言。



历史学家是众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对于大多数其他学者，我们似乎更乐于左右转弯。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内外的史学界有过各种不同的转向。或许最初的变化是社会转向：“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远离精英的历史而转向普通人、平民、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人的经历。然后有了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家适应自己的目的借鉴分析哲学而产生的一种变化。^①语言学转向引起了文化转向以及文化史的复兴。^②自此，史学界产生了一系列超越国别史的变化，如跨国转向、帝国转向以及全球转向。^③在这些史学史的变化中，有许多无疑是转向更好了。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是向更坏转变。但是热心支持者和怀疑论者都不能忽视“转向”这一语言中包含的思想进步。关于“转向”的言论频频出现而又混乱不堪，于是《美国历史评论》近来就“史学批判视角中的‘转向’”举办了一期主题论坛，以考察这一现象。此次对话的多数参与者认为现在应当暂时停止争论，以观察这一变化将历史学家带到了何处，并决定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去向。^④

将这一系列学术动向称为“转向”意味着历史学家总是沿着一条单车道公路驶向未来，纵使这条道路迂回又曲折。本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均推广过“转向”的语言：一位在近期提供了跨学科“空间转向”的总体谱系；

① 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1967); 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London, 2005); Judith Surkis, “When Was the Linguistic Turn? A Genea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3 (June, 2012): 700–722.

②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CA, 1999); James W. Cook, Lawrence B. Glickman, and Michael O'Malley, eds., *The Cultural Turn in U. S.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icago, 2005).

③ Ulf Hedetoft, *The Global Turn: National Encounters with the World* (Aalborg, 2003); Antoinette Burton, ed.,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Durham, NC, 2003); Winfried Fluck, Donald E. Pease, and John Carlos Rowe, eds., *Re-framing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 (Hanover, NH, 2011);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3 (June, 2012): 772–793.

④ Judith Surkis, Gary Wilder, James W. Cook, Durba Ghosh, Julia Adeney Thomas, and Nathan Perl-Rosenthal, “AHR Forum: Historiographic ‘Turn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3 (June, 2012): 698–813.



另一位则专门考察了思想史中“国际转向”的前景。^①然而，现在我们想暂且不谈转向，而是讨论我们认为更具根本变革性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的主题并不是一个“转向”而是旧有历史分析模式的重大“回归”：长时段的回归。^②

作为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视域，长时段大体上消失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近年才重新出现。正像我们试图指出的那样：对长时段的放弃是思想意义的，也是社会意义的；而它的回归既有政治动力也有技术动力。但是，“回魂”的长时段与它原来的“肉身”并不完全相同：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经典论断“对过去风格的回归……（与过去的风格本身）从来不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与其所要回归的事物之间被某些它自身否定的负面参考（或否定之否定等）所阻隔”^③。新的长时段出现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生态系统之中，这里有许多可替代它的思想。它具有之前版本所不具有的活力和灵活性。而对于历史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来说，它还具有更大的关键潜能。它的根源可能存在于过去，但是新的长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未来的。

研究大时间跨度的历史学家在某些领域始终存在：比如，历史社会学或世界体系理论领域。^④然而，正如我们试图展示的那样，在历史学领域中，长时段——最初仅与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学者相关联，但很快广泛普及——发展繁荣然后渐渐消失，此后又带着新的目的、新的活力和更具影响力的前景回归了。本文旨在展现长时段在最近的回归之前消失的原因，解释其回归的原因，分析其复兴的本质，并最终探询长时段的回

① Jo Guldi, “What is the Spatial Turn?”, <http://spatial.scholarslab.org/spatial-turn/>, accessed May 31, 2013; David Armitage,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2013), 17–32 (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critical forum, *Intellectual History* [Taipei], 1 (2013))。

② 又见 David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8, 4 (December, 2012): 493–507; Jo Guldi, “Digital Methods and the *Longue Durée*”, in David Theo Goldberg and Patrik Svensson, eds.,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Cambridge, Mass., 2013)。

③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in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and introd.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1993), 60。

④ 仅举例说明，见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1984); Richard E. Lee, ed., *The Longue Durée and World-Systems Analysis* (Albany, NY, 2012)。



归可能如何改变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使我们的目的意识更为强烈并使我们这些学者和教师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包括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公众与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的与政策指向的。

我们认为当前对长时段的回归不仅仅是可行的，更是紧要的。可行性在于我们可以使用前所未有的史料，也拥有对其进行分析的工具。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现在并不缺乏可供历史学家研究的数据和文本。大规模数字化的数据库使我们得到大量文章。同样地，分析工具也不再是难题。以数字化工具为例，它们天生适合解决分析问题：有覆盖时间范围的工具，如谷歌的 Ngrams；有覆盖空间范围的工具，如“地理剖析器”（geoparsers）。

对长时段的回归也十分紧要，因为许多短期历史对周边学科或非历史学家群体影响有限。它们可能对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却不能因此促成其他领域的转折点，也不能向普通读者和市民解释它们的重要性。短期历史研究对任意一国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可能常常就是不明确的，更不要说对于整个现代化历史了。相比之下，长时段历史尤其允许我们踏出国别史的范畴，探询跨越数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长期综合体的兴起：只有以这样的时间跨度来衡量我们的调查，才能解释并理解当代全球不满的起源。我们认为，长时段的回归也有伦理目的，即建立一个不仅在人文科学内部更跨越整个全球体系互相交流的学术圈，并尝试接受描述我们自身危机时刻的学术成果。

* * *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发表于1958年年鉴上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长时段”这一术语，并在开篇就指出：最初的长时段本身就是“人文科学普遍危机”的产物。这种危机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陌生：包括数据增殖在内的知识的爆发；对学科边界的普遍焦虑；相邻领域研究者之间无法合作；以及对“阴险的和倒退的人文主义”（*un humanisme rétrograde, insidieux*）的沉闷理解。布罗代尔叹惋其他人文学科忽视了历史学对解决这一危机的独特贡献，历史的解决方法从所有人道诉求所关注的社会现实根源出发：“时间的转瞬即逝与仅仅缓慢流动之间的对立（*cette opposi-*



tion... entre l'instant et le temps lent à s'écouler)。”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用于叙事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常规时间跨度：10年、20年，至多50年。然而，危机和循环的历史沿着这些时间脉络发展，掩盖了变动之下更深层次的规律性和延续性。布罗代尔强调，转向一个不同的时间视域，即以百年或千年来衡量的历史，转向“长时段、甚至非常长时段的历史”（l'histoire du longue, même de très longue durée）^①，是十分重要的。

布罗代尔以及追随其后的其他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假定涵盖了数百年或至少几十年的历史学作品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趋势之上的，这一趋势至少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中可以见到；而他们的志向就是要找到历史主体与环境之间跨越长时段的关系。年鉴学派学者希望通过获得定量的史实和有一定标准的变化状态，使以前的作品更加严密、可检验。为了追求这一点，他们对长时段的设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布罗代尔来说，长时段是构成全人类历史的竞争性时间层次中的一个。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1949）的前言中，他对该著作中相继介绍的三种历史进行了经典描述：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几乎静止的历史（une histoire quasi-immobile）；国家、社会和文明节奏缓慢（lentement rythmée）的历史；以及更加传统的事件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也就是那些“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②。相应地，在布罗代尔的解释中，长时段的许多特征十分稳定：它是地理学的时间，而不是地质学的时间；如果这一层次的变动可以察觉，那么它呈周期性而非线性；从根本上来说，它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并且它是所有形式的运动和活动的基础。

1958年的时候，布罗代尔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立关系迫使他承认一个更广泛的长时段结构。如今，文化的长时段，如拉丁文明、几何空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概念，都与自然环境、持久的农业政权及其他相似因素相结合。这些人类的创造也通过不同的世界观或传统展示了在发明及更替时刻的变动或破裂。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文化的长时段比经济循环持续的

^①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3, 4 (October-December, 1958): pp. 725-753.

^② Braudel, "Préface", in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xiii.



时间更长；但是也明显比山岳和海洋形状难以察觉的变化，或是游牧和季节性移牧的节奏短得多。那些不是那么长的时间段能够以世纪来衡量，并且不仅在自然地貌或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可以觉察到它们，甚至在人类思想中也能觉察到。

布罗代尔承认，他关于长时段的早期思考来自1940—1945年在德国的战俘经历：这在部分上是为了逃脱牢狱生活的节奏并用更长期的视角带来希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因为他在解释长时段时经常使用牢狱的比喻。^① 1958年将长时段理论化时，他已经开始相信长时段对于任何学科间的理解都是基础性的，且提供了走出战后现代主义的唯一道路。他的直接动机既来自思想层面，同时也来自制度层面。在那篇文章出现前不久，布罗代尔接替1956年去世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承担了年鉴的编辑工作以及著名的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系的主任职位。他要为历史学在其他社会学科中的存在、甚至是首要地位进行辩护，尤其是在经济学和人类学还有数学中。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之下，威望和经费与专业荣誉一样危如累卵，长时段则成为一张“王牌……使他得以宣称历史而不是数学为人文学科统一者”^②。

布罗代尔将长时段与事件史对立起来，不是因为后者只能处理转瞬即逝的现象——众所周知，也就是他在地中海研究中所鄙弃的“萤火虫”和“泡沫”——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与事件结合得过于紧密的历史；他指责说，这就像当代经济学家一样，将他们的作品束缚在时事和国家统治的短期要务之上。^③ 这样的历史理解形式，与权力紧密相连且只关注当下，逃避解释又厌恶理论，实属鼠目寸光：在布罗代尔看来，这种历史观既缺乏临界

^①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 - 1989* (Oxford, 1990), 33; Paule Braudel, "Braudel en captivité", in Paul Carmignani, ed., *Autour de F. Braudel* (Perpignan, 2001), pp. 13 - 25. Braudel's lectures in the camps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as "L'Histoire, mesure du monde" (1941 - 1944), in Fernand Braudel, *Les ambitions de l'histoire*, eds. Roselyne de Aya-la and Paule Braudel (Paris, 1997), pp. 13 - 83.

^② Giuliana Gemelli, *Fernand Braudel e l'Europa universale* (Venice, 1990), 246 - 300; Maurice Aymard, "La longue durée aujourd'hui. Bilan d'un demi-siècle (1958 - 2008)", in Diogo Ramada Curto, Eric R. Dursteler, Julius Kirshner, and Francesca Trivellato, eds., *From Florenc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ur of Anthony Molho*, 2 vols. (Florence, 2009), II, 559 - 560 (quoted).

^③ Witold Kula 立即对此进行了反驳，详见 "Histoire et économie. Le longue duré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5, 2 (March-April, 1960): pp. 294 - 313.



距离又缺乏思想实质。他给所有社会科学的解决方案都会是回到过去的模式和问题，例如，马克思提出的商业资本主义疗法，这位“天才”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模式（vrais modèles sociaux, et à partir de la longue durée historique）。简而言之，早在50年以前，布罗代尔自己也已经建议在建议我们回归到长时段了。^①

紧随布罗代尔之后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中，有一大批开始不再将长时段模式作为一种恰当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时间）跨度问题的放弃以及近年来新长时段的回归，与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的概念来源一样，都是有关战争带来的恐惧的故事。比如在美国，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G. I. Bill）》引起了各个领域内研究生项目的激增，其中也包括历史。培养一个博士所需的时间从三年扩展到六年，甚至经常超出这个时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报告称，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有新一代学生在美国专业化大学的背景下达到了攻读研究生的年龄，“大多数领域的学术劳动市场达到饱和和状态，人们开始担心博士学位是否生产过度”，“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从1957年的8611个增长至1973年的33755个，平均每年几乎增长9%”^②。

这一代历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与档案文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领域中，既能得到集体的专业独立性，又能得到个人的成功。对专门化的需求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对档案的掌握成为专业化的指标，对时间的关注也变得更加必要。在美国历史学界早年的博士培养中，一篇硕士论文可能涵盖两个世纪或以上，比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关于整个北美历史上的贸易港的研究，还有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关于1638—1870年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的作品。^③ 近来一个关于19世纪80年代以来写于美国的约8000篇历史博士学位论文的调查显示：1900年，平均每篇论文涵盖的时

①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735, 751.

② Lori Thurgood, Mary J. Golladay, and Susan T. Hill, “U. S. Doctor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Special Report”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June, 2006), 7; <http://www.nsf.gov/statistics/nsf06319/pdf/nsf06319.pdf>, accessed May 31, 2013.

③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Indian Trade in Wisconsin: A Study of the Trading Post as an Institution* (Baltimore, 1891); W. E. B. Du Bois,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895).

间段约为 75 年；到 1975 年，这一数字已降至 30 年左右。直到 21 世纪，平均每篇论文涵盖的时间段才恢复到 75—100 年，这就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断定并主张长时段总体回归的证据。^①

博士学位论文中涵盖年数（红色表示中值年数，蓝色表示平均时间长度）
（表中横轴：论文写作年份；纵轴：论文涵盖年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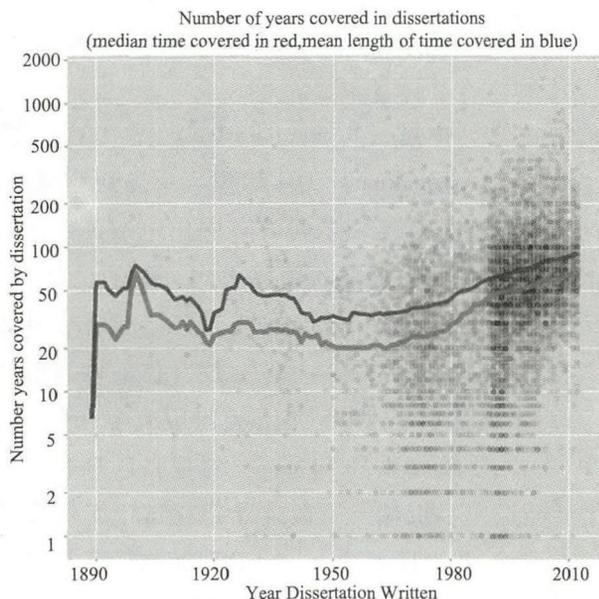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涵盖年数，c. 1885—2012：

Benjamin Schmidt, “What Years Do Historians Write About?”,
Sapping Attention, May 9, 2013.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随着专业化和专业性的上升，对专门化——“对越尖端的事物了解越广泛”的担忧开始出现，最初是在科学领域内，但之后逐渐扩展。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抱怨专门化在其领域内造成了严重碎片化。

^① Benjamin Schmidt, “What Years Do Historians Write About?”, *Sapping Attention*, May 9, 2013; <http://sappingattention.blogspot.com/2013/05/what-years-do-historians-write-about.html>, accessed May 31,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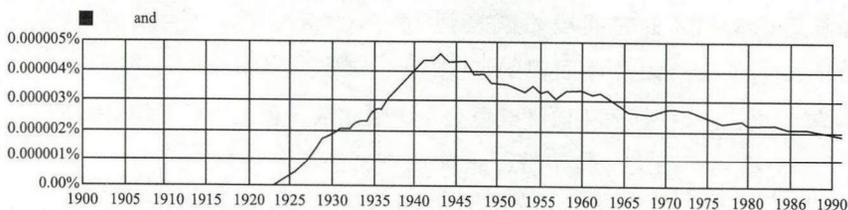


图2 “对越尖端的事物了解越广泛”的使用，1900—90：谷歌 Ngram 浏览器。

研美学者伯纳德·贝律恩 (Bernard Bailyn) 在 1981 年美国历史学会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的主席发言中提到：“历史探究立即产生了一百个方向的分支，并且互相之间没有协作……要使它们综合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即便是在有限的领域之内，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挑战”恰恰是“为大范围历史建立秩序，并由此通过讲述重要主题、呈叙述性结构的综合性著作，将其重新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大众”^①。不久之后的 1985 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另一个前主席，法国历史学家 R. R. 帕尔默 (R. R. Palmer) 对他自己从事的领域也表示了不满：“专门化已经走向了极端……很难看到这样程度的专门化对年轻人的教育或是大众启蒙作出的贡献。”^② 在 1987 年的英国，年轻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卡纳迪恩 (David Cannadine) 也同样痛斥“专业主义崇拜”，称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书写着越来越学术的历史，而越来越少的人会阅读它们”^③。卡纳迪恩警告说，这样的结果“经常是，历史学家作为公共教师的角色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专业化已然导致了边缘化。当历史学家仅在彼此之间谈论更加狭隘、研究时限更短的主题时，他们就逐渐与非专家读者相隔绝了。

彼得·诺维克 (Peter Novick) 在其关于美国历史专业的说教性传记

① Bernard Baily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1982): pp. 2, 4, 7-8.

② R. R. Palmer, “A Century of French History in America”,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4 (1985): pp. 173-174.

③ David Cannadine, “British History: Past, Present - And Future?”, *Past and Present* 116 (August, 1987): 176, 177.



《那高尚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1989) 中指出, 他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色列没有国王”^① 变得清晰的那一刻。带着对“深描”的强调的人类学转变; 微观史学从意大利经法国传入美国; 身份政治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来的自由主义主体的不稳定: 这些都是将历史学构造扯碎的离心力。^② 然而这些来自贝律恩、帕尔默、卡纳迪恩和诺维克的哀叹可能并没有抓住中心要点: 主要的问题并不是破碎, 而是这些运动所显示出的——短时段的胜利。在这一时代, 即美国思想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 (Daniel Rodgers) 称之为“破碎的时代” (Age of Fracture), 从根本上是由时间视域的收缩定义的: “在 20 世纪中期, 历史呈现出的厚重、不可避免和引人注目超过了社会话语的影响。严肃的谈论历史就应当讨论长期、大规模的时间运动。”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商业周期和历史学家的长时段的不可动摇”, 全都被紧缩的时间感代替, 而后者仅仅关注一个短促的瞬间: 现在。^③

当然, 较短的时段在影响专业历史写作之前, 也有其文学地位。从普鲁塔克 (Plutarch) 的比较列传《希腊罗马名人传》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到塞缪尔·斯迈尔斯 (Samuel Smiles) 的《1874—1999 年间工程师的生活》 (Lives of the Engineers, 1874—1899), 传记通过经常关注这些典范式的人生故事中可以见到的所谓历史“个性”类别, 为历史的写作奠定了有益的道德基准。对短时段历史的强调也出现在历史被召来帮助解决长时段视野彼此之间的矛盾时。阿克顿勋爵 (Lord Acton) 认为, 纪实历史 (documentary history) 约于 1830 年出现, 米歇利特 (Michelet)、麦金托什 (Mackintosh)、布赫霍尔茨 (Bucholtz) 以及米涅 (Mignet) 成为其先驱。获得文献、翻阅教会及本地档案都与解决法国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愿望——即视其为对自然权威的反叛还是“一切历史的成熟果实”结合起来。^④ 一场文献革命随之发生, 在此历史学家的角色从叙事

① 原文是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eal”, 意指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里用来表示史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的碎片化。

②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1988), pp. 577 - 592.

③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Cambridge, Mass., 2011), 255.

④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06), 14.



的艺术家和合成者变为了政治评论家，平息着关于研读珍贵文献权力的激烈争论。在这一角色中，制度史承担了解读自由主义传统的任务，并通过对关键时刻的目标性研究来解决，如埃利·哈勒维（Elie Halévy）的《英格兰在1815》（*England in, 1815*）（1913）。短时段历史经常关注新闻评论、特定的争论以及有争议的时段，例如，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作品《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1940），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从远距离的角度再次深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端时逐渐消逝的乌托邦主义现实。^① 这些作品主要出现在历史研究专业化之前，或出自未经认可的作者之手。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前从未有过整整一代专业历史学家如此断然地与长时段思想决裂，婴儿潮一代出生的学者拒绝具有相关特点的写作风格，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出生于他们那一代之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作品，从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4）到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滚滚向前//约旦，滚滚向前》（*Roll, Jordan, Roll*）（1974），补充了作为长时段冒险的被压迫者的经历，借用了民俗学研究的技术，如对民间诗歌、笑话以及言谈体态的研究，来描述工人阶级、奴隶文化以及平民和精英之间广泛存在的态度紧张关系的特征。^②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微观劳动史学家的作品中，这种描述伟大时刻的意愿转变了，例如琼·瓦拉·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和威廉·斯维尔（William Sewell），他们在其作品中将注意力缩小至一个单一的工厂车间或是一个社区内的交流模式，并从社会学中引入了关注个别行为者和细节的习惯。^③ 理解的任务从对总体的概括转变为社区的微观政治学和某一战役在更大范围的阶层斗争中的成败。

大规模地放弃使社会史长期以来保持活跃的大问题和大范围，部分上

① Elie Halévy, *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iècle*, I: *L'Angleterre en 1815* (Paris, 1913); Robert Graves, *The Long Week-End: 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 (London, 1940).

②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4); 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4).

③ Joan Wallach Scott,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1974); William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1980).



是一种针对知识分子“家长”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些“家长”主导会议，对年轻历史学者提出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甚至玩笑般地将新历史贬低为学究式运动。研究现代德国的历史学家杰夫·伊雷（Geoff Eley）在他的自传体报告《弯曲的线》（*A Crooked Line*）（2005）中纪念了这一瞬间，他从一个出生于战后婴儿潮时期的英国孩子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他面对紧张的就业市场，与他的同侪一道使用新方法来获取文献，为争取他们的专业地位而奋斗的故事。伊雷认为，文化转向对年轻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个人的解放，他们“处于干枯、空洞的传统史学作品约束之下”，理论对于他们来说“从认识论上复苏了文献的生命”。从修辞学上来说，年轻历史学家此时对年长者的反叛，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反战、争取言论自由和反对种族歧视的青年运动十分相似：它反映了对良知的呼唤，以及将历史研究机构与更为关键的政治相结合的决心。谈到对这一反应的“大暗示”时，伊雷十分直接地指出：实行国际统治的腐坏机构在前几个时代是长时段历史的主要消费者，而他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则以与其决裂的方式来看待政治。^①

在这场战役中主要使用的武器是对当地细节的关注，这来源于城市史传统，德国和英国的城市史就经常将劳动纠纷作为城市社区故事的一部分进行叙述。确实，历史学家诸如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和大卫·洛蒂格（David Roediger），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越来越强调极其本地的事件，这使得历史学家得以检验社群中的种族、阶层和权力等因素，即他们认为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运动无法促成国家转型的因素。^② 利用晦涩难懂的文献成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成年仪式；这能够判断他是否受到关于方法论和复杂理论的良好训练，是否阅读了大量历史文本以及对文献的熟稔程度。能够使用一个迄今未被利用过的知识库，标志着人们十分了解这些文献，并已经能够鉴别出其中的纰漏；也标志着人们手边有用来解读任何历史记录的各种历史分析工具，不管作者的身份有多模糊或多复杂。

^① Geoff Eley, *A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Ann Arbor, 2005), 129-30.

^② 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1983); David R. Roediger,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1991).



典型的动向是一种新微观史学的出现，它摒弃了宏大叙事或精神教导中的一切虚伪，而支持关注一个特定事件：例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喧闹庆祝或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大屠猫。^① 微观史学发源于意大利和法国，最初是一种检测长时段问题的方法，因此它并不是天生与时间深度格格不入，比如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关于女巫安息日的一项研究，就涵盖了从一天到千年的历史范围。^② 但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学界，微观史学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其研究建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范围基础上，且对文献的使用越来越集约。在某种意义上，某段特定文献越晦涩或越难于理解越好：这段少见的文献越能显示作者在关于身份、性向、方法和主体的大量且互相矛盾的理论中游刃有余，使用这段文献就越能证明学者熟知史料、长期投身于专业历史训练以及对此领域透彻的理解。也有一些例外，文化转向的经典论著只关注一个特定时期：例如，鉴别心理学内部的某一特定混乱，或者是分析劳工运动中的某一特定暴乱。^③ 随着文化转向的到来，几乎每个社会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开始尝试短时段历史写作，以契合行政决策的特定形式，但每一个都成为劳工、医药、性别或家庭生活漫长历史中的一个脚注。心理学诊断的案例遵循着一定的模式，每项研究的历史时期都受到限制，且与涉及最开始研究的医生所生活的时代相一致——歇斯底里症的诊断、催眠术的流行、广场恐怖症的诞生，或是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疯狂的旅行者》（*Mad Travelers*）（1998）中关于神游状态的论述，脱离了20年来的医学传统，就突然剥

①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1975);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② Carlo Ginzburg, *Storia notturna: una decifrazione del sabba* (Turin, 1989); 对此更广泛的论述，见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ó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2013).

③ 例如，R. B. Rose, "The Priestley Riots of 1791", *Past & Present* 18 (November, 1960): 68-88; John Bohstedt,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90-1810* (Cambridge, Mass., 1983); Colin Haydon, *Anti-Catholic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 1714-1780* (Manchester, 1993); Ian Haywood and John Seed, eds., *The Gordon Riots: Politics, Culture and Insurrection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2012).



夺了它的“生态位”^①。

5年至50年的自然时间跨度成为跨领域历史学著作的典范。微观史学家完成了使历史写作产生彻底变革的壮举，这些作品主要关于联盟和种族主义、白种人的本质和历史作品本身。实际上，自那时起，就有大量博士论文关注局部微观，历史学者将其作为竞技场，在有限的训练时间内操练书写传记、阅读文献以及历史分期的技能。在微观史学的年代，那些保守派论文最有可能打动评审委员会，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指导教授就敦促年轻的历史学者来缩小而不是扩大在地点和时间上的关注点，他们坚信关于性别、种族和阶层的严肃作品应当忠实地来自最小而不是最大的图景。然而，伊雷认为，有政治参与的社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恰恰因为它对局部的过度关注：“假以时日，宏观史学捕捉社会整体走向的兴趣与微观史学关注特定地区之间的……这种亲密和互惠——会被扯断。”伊雷甚至将局部社会史与另一种政治导向的历史相比较，从年鉴传统来看，这更像他自己承诺的一个对当下历史进行“总”评论的项目。^②

退回到短时段并不限于社会史范围，也不限于美国历史学界。大约在同一时刻，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带领思想史学家对此领域内不同的长期趋势进行了控诉——尤其明显的是针对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历时性观念史以及对“伟大经典”的权威研究方法，即使得政治理论广泛传播的方法——以支持比以往更加严格的修辞和时间语境。其后，所谓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关注于共时的和短时段的论述背景，将其作为精确安排的语言游戏步骤或是具体的语言行为，而不是作为对永恒的思想或是经久不衰的概念的例证。语境主义者最初对手是马克思、纳米尔（Namier）和洛夫乔伊，但是他们的努力通常被解读为对落后事物、抽

^① Ian Hacking, *Mad Travelers: Reflections on the Reality of Transient Mental Illnesses* (Charlottesville, 1998); Ilza Veith, *Hysteria: The History of a Disease* (Chicago, 1965); Robert Darnton,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1968); William J. McGrath, *Freud's Discovery of Psycho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Hysteria* (Ithaca, 1986); Rachel Maines, *The Technology of Orgasm: "Hysteria", the Vibrator, and Women's Sexual Satisfaction* (Baltimore, 1998); Georges Didi-Huberman, *Invention of Hysteria: Charcot and the Photographic Iconography of the Salpêtrière*, trans. Alisa Hartz (Cambridge, Mass., 2003); David Trotter, "The Invention of Agoraphobia",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2, 2 (September, 2004): 463-474; Mark S. Micale, *Hysterical M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Male Nervous Illness* (Cambridge, Mass., 2008).

^② Eley, *A Crooked Line*, 184, 129.



象概念和宏大理论的攻击。然而1985年斯金纳为宣传人文学科中“宏大理论的回归”而付出的个人努力受到悖论的困扰，许多鼓舞或代表了这一复仇的思想者——这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库恩（Kuhn）、福柯（Foucault）以及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表达了“强调局部和偶然的意愿……以及与此相应地，对包罗万象的理论和非凡的解释方案的强烈厌恶”。因此，20世纪80年代关于宏大理论回归的报告就被夸大了。远非回归，它只是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隐退到了暮色中。^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历史于是进入了一个退回跨多领域的短时段研究的时期，从社会史到思想史几乎同时发生。历史学家长时段综合体技艺与纪实历史或传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不是新鲜事了。对极端的思辨史的亦步亦趋，是自阿克顿勋爵以来的文献转向问题，甚至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也尽量将自身与马虎或凌乱的特性及抽象印象区别开来。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前，从未有过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如此决然地与长程分析决裂，且产生了如此长期且广泛的影响。

长时段历史从未完全从大西洋两岸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列表中消失。但是，在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对辉格式目的论的反对和不断进步的反本质主义的驱使下，对档案的掌握、微观史学和对偶然时间及语境的强调相结合，这就决定了人们将更加关注共时的和短期的（历史）。对个案研究、单独个体和特定的语言行为的强调逐渐取代了布罗代尔、纳米尔、芒福德（Mumford）、洛夫乔伊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长期模式，还有达恩顿、戴维斯、伊雷和斯维尔的微观史学。在这一年代中，学界被有关短时段的微观历史和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所主导。仅仅十年以前，一位法国观察家悲观地评论：“当后现代主义强迫学者走向破碎和短暂的研究时，所谓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可能现在看起来是过时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我们可能日趋靠近却不能企及的渐近理想。”^②但是，过时的东西也可以快速成为新时髦。长时段不再是不可接近的；它的所有承诺现在都触手可及。

^① Quentin Skinner,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Skinner, ed.,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1985), 12;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pp. 495 - 496.

^② Jean Heffer, "Is the *Longue Durée* Un-American?", *Review* 24, 1 (2001): 137.



* * *

为了回归长时段，最好的前进方法可能就是回顾。一般而言，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的重要历史著作信守神学、地理学、宇宙学，试图讲述跨越广泛时间跨度的整体综合历史。对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奥古斯丁来说，历史试图认识将人物传记研究与异域文化中的人类学与地理学研究相统一的线索。他们长期在这个范围的时间跨度内进行历史叙述，以达到说明普遍知识的目的。随着黑格尔的出现，趋于长期、普遍的民族进步取向受到了启蒙的影响，一个新的道德目的在民族国家形态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在此全球史研究会在神圣意志的启示下通过物质现实帮助每个国家辨别它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正是一项为了理解全球的研究，麦考利（Macaulay）和米科莱特（Michelet）记录的20世纪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形态随处可见民族道德意图，它们向着帝国、革命、自由主义、贵族政治和民主等不同方向发展，在此可以利用长远眼光将其置于历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

直到20世纪，长时段（当然，尽管它逐渐不再使用这个名字）为在改革的关键时期重新书写历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工具。例如，进行长程对照使得费边主义历史学家，如R. H. 托尼（R. H. Tawney）、比阿特里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以及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和芭芭拉·哈蒙德（Barbara Hammond），能够为重新设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代渊源提供帮助。韦布夫妇认为，现代参与性、代表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根基存在于中世纪教区政府的核心中。托尼认为，在现代早期，商品导向型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粮食导向型的贫穷农夫之间的斗争，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和土地改革时代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抗争提供了先例。^①

长程历史是了解现代制度意义的工具，也使人们得以理解乌托邦式的设计，并思考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方案。实际上，托尼的生涯代表了那一代思考长时段的历史学家中的激进分子所为。1931年，他被国际联盟派遣到

^① Beatrice Webb and Sidney Web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9 vols. (London, 1906—1929); 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12).



中国后，创作出版了一部中国农业史；奇怪的是这部农业史听起来类似于他著述的英国史，其中，地主与农民的闹剧构成了历史的终极中心，并暗示了对合理土地改革的迫切需要。^① 因此，托尼的论断本来与劳合·乔治时代英国的人民预算案和土地改革相联系，而历史允许他将其推广到整个世界。正如透过马克思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打磨的镜片看到的长时段历史所叙述的，一个关于土地的阶级斗争动力学的普遍真理，可以用于论述某一特殊的民族传统以检验其真实性，然后就其他地区进行有说服力的验证。这种应用不同于与布罗代尔同时代的观点，布罗代尔谴责后者过于现代主义、对权力不加批判且回避因果及理由等根本问题。

后来，专业历史学者退回到短时段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切断了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改革者，以及最终与国际管理者之间的早期对话，而这一对话正是对长时段的强调所促进和鼓励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一段时期，一系列新的机构开始全力解决国际发展问题。每当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企图进行政策的重大转变时，他们就转向历史学。这一时期最大的争论之一是是否继续激进的土地再分配项目；大英帝国将其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折中方法在爱尔兰强制执行，在国内和苏格兰也通过“人民预算案”和“战后土地国有化方案”将其贯彻到底。新近独立的印度几乎立即立法通过了土地改革措施。在联合国内部，土地改革被鼓吹为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种和平改革路径。在所有的这些争论中，关于土地利用、私人财产和农业政策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有托尼、琼·瑟斯克（Joan Thirsk）以及其他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他们证明了农民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在 E. P. 汤普森之前时代圈地运动的悲剧。

国际发展机构转向历史学，以期自由、独立、经济增长和国家间的互惠调解提供一个方向标。例如，联合国食品及农业组织（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创办理事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他的职业生涯即始于出版一部有关饥饿的回顾性历史著作，这部著作以恺撒征服不列颠为开端，以1920年《农业法案》带来的农场劳动力与地主之间关系的进步为结尾。^② 20世纪50年代以前，历

①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1932) .

② John Boyd Orr,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Agriculture* (London, 1922) .



史学家如大卫·兰德斯 (David Landes) 已经调整过工业革命史的研究以直接支持“绿色革命”政策, 他许诺紧随不断发明的历史而来的是富裕的未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农业经济学家伊莱亚斯·图马 (Elias Tuma) 和英国地理学家罗塞尔·金 (Russell King) 等土地改革理论家转向长时段史, 他们在为国际政策机构出谋划策时综合了历史学家的成果, 以自古罗马以来农民为参与到农业帝国中而进行的 700 个世纪的斗争为背景来考察现代土地改革。^①

还有许多关于土地政策的长时段历史可供他们参考。正当联合国的创始国争论“南半球”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道路上的适当干预时, 大西洋两岸仍有很多亨利·乔治的追随者, 为提供一种历史的解释而转向了长时段; 他们将地主的垄断解读为现代历史上的显著犯罪, 将流行的土地所有权解读为这一犯罪的必要解决手段。乔治主义历史出现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奠定了自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美国的农业传统。乔治主义历史学家努力说明地主剥削的潮流以及民粹主义政府有必要持有这些在海湾获得的土地。1945 年, 阿尔弗雷德·N. 钱德勒 (Alfred Noblit Chandler) 出版了他的《土地所有权的起源: 强迫和欺诈的故事》(*Land Title Origins, A Tale of Force and Fraud*), 这是一部论述资本家对土地的无限制权力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他将问题归咎于那些与乔治同时代的铁路贵族以及他们对政府赠予地学院的权力。^② 1957 年, 艾伦·萨克尔斯基 (Aaron Sakolski) 出版了《美国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税收》(*Land Tenure and Land Taxation in America*), 其中他提出了一种基于连续修正物权法漫长过程的美国思想史, 指向一个关于土地所有权历史的长期争论, 这一争论跨越了亨利·梅因 (Henry Maine)、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Fustel de Coulanges)、韦伯 (Weber) 和 G. R. 盖革 (G. R. Geiger)。^③ 最终, 他推论到, 关于土地的指令是对正义概念的反思, 而正义从核心上来说是一系列宗教和精神的價值, 能够共同

① Elias H. Tuma, *Twenty-six Centuries of Agrarian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rkeley, 1965); Russell King, *Land Reform: A World Survey* (London, 1977) .

② Alfred N. Chandler, *Land Title Origins, A Tale of Force and Fraud* (New York, 1945) .

③ Paolo Grossi, *An Alternative to Private Property: Collective Property in the Jurid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hicago, 1981); George Raymond Geiger, *The Theory of the Land Question* (New York, 1936) .



获得土地直接反映了每个人都重视的准则，不论穷人还是富人。萨克尔斯基写道：“早期基督教会教父受到古代希伯来传统影响，他们的正义概念因此与土地所有权相关，也遵循着一样准则。”^① 向前回溯一直到圣经时代，我们都可以在有土地的精英中找到挑战资本积累的道德先例，并且现在这些先例被包装成国家和国际范围内法律行为的一个先例。

当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理解到自己的部分工作受到利用其长时段视角作为公共改革材料的行政人员和社会科学家的关注时，这些争论就促成了一种气候。从20世纪30年代的托尼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专业历史学者著述西方和印度的土地问题，长时段与这一问题联系起来，并引起了关于制度参与者和公共目的的更大问题。他们的学术成果促成了历史学家和国际管理机构之间的对话；并在研读特定文献、事件和特性，努力学习此领域内其他学术成果的帮助下使其延续了几百年。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人的学者们——正是伊雷和斯维尔对抗的那一代人——长时段历史已经成为说服官僚和制定政策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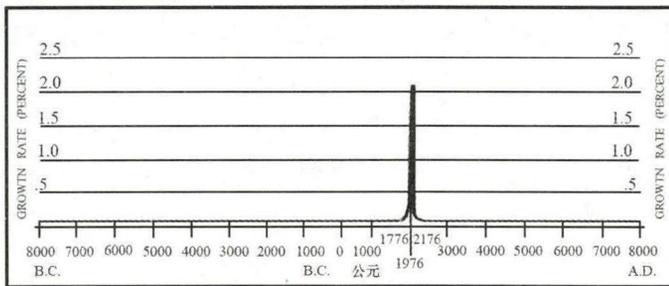
社会历史学家如托尼提出的经典长时段，利用其对制度和运动的深层过去的理解使读者相信有社会变革的必要，而（政府）智库和非政府组织（NGO）正将其盗用至一种“混杂长时段”中。在这一混杂长时段中，非历史学者根据一系列贫乏的历史证据，得出广泛传播的关于社会变革趋势的结论。他们很少肯定二手资料，也不尊重涉及该时期或事件的早期思考传统。典型情况是，他们会立即摒弃马克思主义观点或其他左翼观点，提出一种似乎与自由市场思想、对技术进步的信仰以及西方智慧许诺的未来赏金相一致的历史解释。当然，在教导公众的角色上与大众历史相联系这方面，混杂的长时段之前已有先例，例如，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的《大不列颠的商业霸权》（*Commercial Power of Great Britain*）（1825），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的大众技术史。

历史学可以用于宣传政治倾向已不是新鲜事了。然而任何新派别的出现都需要政治条件和体制条件的密切合作。在战后的美国，随着NGO、美利坚帝国以及跨国管理机构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扩展，人们急于了解如何应对诸如饥荒、贫困、干旱和暴政这样巨大的问题，长时段历史受到广

^① Aaron M. Sakolski, *Land Tenure and Land Tax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57), 13.

泛关注的条件已经建立起来。正当婴儿潮一代出生的历史学家避免直接讨论这些问题而转向研究种族和阶层的微观历史时，关于贫穷和饥饿的长时段历史却成为没有接受过历史专业训练的畅销作家的领域。混杂的长时段史遍地开花，但历史学家之手却没有浇灌它。国际管理对实用历史故事的需求激励了无比包容的大型综合性成果的产生。对历史认识的需求，实际上是对处理历史数据的抽象和理性飞跃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些主张中，最绝妙的是由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提出的，他最初是一名物理学家后来转型为系统理论家；他承诺要通过检验世界历史上的长期趋势来终结关于能源利用、环境灾难和消费的争论。卡恩绘制的流线型历史数据图表，显示了自公元前 8000 年以来人口增长与未来技术进步和人口控制的抗衡，其结论是预见见了后工业化时代“日渐充盈”的世界。

Figure 4.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n Long-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URCE: Adapted from Ronald Freeman and Bernard Berelson "The Human Popul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74, pp. 36-37.

Turning Points i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Product 29

图 3 长时段历史视角下的人口增长率

Herman Kahn, *The Next 200 Years: A Scenario f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1976), 29.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个别机构主管人员提出的关于其自身行为准则的历史主张。例如，1970 年，威廉姆·D. 克拉克，世界银行的信息主管，在一次演讲中将发展经济学表述为世界历史的转折。他的结论几乎不建立在任何历史数据的基础之上，却强调了发展经济学较于当时任何其他政策方案的重要性，他宣称：“当今不会被称为核年代，或太空年代，或美国



的世纪，或普通人的时代；它将被称为发展年代，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与他们不能再容忍的环境和习惯进行抗争的年代。”克拉克说，与这一伟大的问题相比，历史学家仅会将美国的公民权利看作一个“小冲突”^①。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这种对长时段历史的追捧开始逐渐暗淡下去，成为自重的历史学家不会染指的浊物。此外，仍旧停留在长时段游戏中的那些历史学家承受着给由针锋相对的思想相区分的不同读者作报告的压力，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的国际背景下。想一想卡洛琳·韦尔（Caroline Ware）的经历，她的著作《人类的历史》（*History of Mankind*）是1954年至1966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委托完成的多卷本研究。韦尔的著作提交给代表UNESCO的国家公务员评论，于是陷入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拔河战：俄国和法国的读者，新教和天主教的评论者，都游说UNESCO修订一版能反映其自身国家或意识形态观念的世界历史。对于像韦尔这样受命于国际管理部门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成功取决于制造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都能够同意的综合体，但事实证明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评论者强烈要求修改内容，以至于这一项目的员工对于能够写出一部在这样的框架中能够行得通的综合性的历史著作几近绝望。卡洛琳·韦尔自己在信中写道：“要写出一部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能的。”^②为国际政府部门书写历史是如此令人沮丧的经历，这使得长时段这一历史体裁更加灰暗。韦尔在语言上妥协的挫折，是社会历史学者同仁们在文献上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些经历，还有许多与它相似的经历，总地说来为这一代历史学家放弃长时段历史提供了主要的根据。

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之后，历史学家成为一群拒绝与未来主义者“同流合污”的人；他们认为混杂的长时段历史与微观史学不同，它仅仅是新闻工作者和权威的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这种混杂的长时段因此在课堂中也很少被提及，更不再受到争论或模仿。微观史学的作品扩展了我

^① William D. Clark, “Creating Political Will”, in Colin Legum, ed., *The First U. N. Development Decade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1970's* (New York, 1970), 148.

^② 引自 Grace V. Leslie, “Seven Hundred Pages of ‘Minor Revisi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aroline Ware, the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Trials of Writ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a Bi-Polar World, 1954–66”, Panel,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U. S. Power: Rethink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Midcentury”,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ouisiana, 3 January 2013.

们对农民生活、不同类型的心理冲动（公开的和私密的）以及人类经验的构造的认识。但是在历史写作方面，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抛弃了更严厉的道德批判的修辞学的实践，这种实践是长时段下社会形态的另一种来源，是非历史学家也能掌握的。

在意识形态分裂的时代，社会科学家如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和威廉姆·斯维尔（William Sewell）迅速地从国际政府组织机构的聘用中脱身。与他们的主管那一代正相反，斯科特和斯维尔的履历表中充满了在同行评审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其中很多受到法国理论界的影响。他们的退出是大规模的：他们不再充当世界银行的顾问，也不再书写为供政府机构领导消费而设计的长时段历史。随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再为世界政府性机构工作，经济学家取而代之了。有影响力的组织不再关注历史学，其后果也表现在除历史教学部门之外的许多其他方面：较为普遍的是在社会科学内部涌动的一种“科学羡慕”，它也引起了模仿行为；对博弈论和理性行为者的关注——换言之，重新退回到对个体和抽象的研究，而不再是大规模的具象研究。法学院和政治科学系出现了一种对案例分析的政策导向型关注，在这些部门中，历史学几乎不为将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未来官僚服务。他们在累积数据的过程中忽视了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的观点，从而无法从近40年间历史学对本体论及认识论的革命性批判中受益。婴儿潮一代为历史学家理解世界的的能力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却以消耗历史学家回应管理机构的能力为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致从1968年到2008年，大部分历史研究方法被看作是拒绝评论当代或未来全球事务的一种道德危机以及身份内向型理论化的证明。在那一时代，历史学家走出其先前的角色，即政策咨询者、国内外合作或公民及社会合作的预言家。反而，他们将自己视为一种不公正的形而上学，在种族、阶层和性别方面进行写作，并且通过行业内的专业评论家——尤其在心理学、婚姻和法律领域——来使其更加完善。当他们精进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及工具时，同时也将其对密切关注的学术习惯强加给它，并在此时以一种不切合实际、将历史学家作为高塔中的天文学家、远离政治和经济蓝图的程度达到顶峰。

危机的一部分源于历史学家越来越不愿意以专业顾问的角色介入国际



关系和公共政策的争辩中。与托尼或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一代相比，斯维尔和达恩顿一代的历史学家大大减少了对政治事件的评论。相反，就长期变化的理想可能性对公众及政策决策者进行劝诫的角色，大部分分给了我们经济学系的同事们；他们对社会历史学家早就从帝国和工业化中得到的道德教训借鉴得少之又少，其结果就是将自由市场理想化的理论占据了报纸头条和政策界。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及其他美国社会评论家抱怨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越来越不相干的现象，并怀旧地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知识界以及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在公共领域起到的积极作用。^①回想那些全情投入的前辈，在许多同事看来，就像是人文科学现在完全抛弃了公众。在90年代末，更年轻的一代历史学家，恰好出生在婴儿潮的高峰之后，开始重新考察长时段的问题。他们中许多都是受过训练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学者，对于他们来说，闭口不谈长时间跨度尤为痛苦。近来，中世纪史学者丹尼尔·洛德·斯迈尔（Daniel Lord Smail）引领人们进入一个与进化生物学的对话中，开始探讨人类身份与消费主义的历史分期问题。^②

关于“世界历史”和“大历史”的问题拓宽了叙事的范围，并开始包含一种从环境角度重述的历史，将人类历史事件置于更长的自然进程背景中进行叙述。长时段的“回归”，部分地建立在历史学家对微观史学失败的不满基础之上，由此开始了它的起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历史学家在大学甚至这个世界中位置的道德反思。除了这些道德原因，还有两个技术因素也影响了历史学家在工作中的活动。第一是我们拥有了大量可自行支配的文献，第二是我们有了更多工具。除去道德因素或关于全球气候的辩论，这两个因素也都驱使历史学家开始思考更长的时间周期。

① 对这一时代的叹惋包括：Russell Jacoby,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New York, 1987); Michael Bérubé and Cary Nelson, eds., *Higher Education under Fir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1995);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Mass., 2003); Jules Chametzky, "Public Intellectuals", *MELUS*, 29, 3/4 (October, 2004): pp. 211-226; Jo Guldi, "The Surprising Death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 Manifesto", *Absent* 1, 2 (2008): <http://archive.org/details/TheSurprisingDeathOfThePublicIntellectualAManifestoForRestoration>, accessed May 31, 2013.

②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2008).

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知识界都可以找到长时段回归的证据。一位拉丁美洲文化学者评论：他所在的领域，“关于长期历史轨迹的假定理论曾显得过时”，但是变化之风渐起：“现在长时段回来了。”一位欧洲文化历史学家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同事说：“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明确地寄希望于性向的长时段中。”一位美国研究学教授评论道：“最近浏览过相关领域的书名、会议、研究组甚至摘要的文学研究者，不可能错过……为文学和文化评论做出了大量实质分期工作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地理学的（大西洋世界），另一个是“一个时间单位——长时段”^①。最近的研究成果将冷战和移民、黑海和阿拉伯之春、女性的精神、德国的东方主义以及奥地利历史置于长时段视角之下。^② 甚至是在历史类书架上草草浏览新上架的书本，也能发现许多这样主题的书籍：关于长期历史、跨越 500 年的环球旅行；关于最初 3000 年的基督教世界；关于“从斯巴达到达尔富尔”的种族大屠杀以及“从古代到当代”的游击战争；关于过去 15000 年的人

① Jeremy Adelman, “Latin American *Longues Duré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9, 1 (January, 2004): 224; Thomas W. Laqueur, “Sexua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e *Longue Durée*”, *Sexualities* 12, 4 (July, 2009): 418; Susan Gillman, “Oceans of *Longues Durées*”, *PMLA* 127, 2 (March, 2012): 328. More generally, see Barbara Weinstein, “History Without a Cause? Grand Narratives, World Hist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0, 1 (April, 2005): 71–93; Davi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9, 4 (December, 2010): 6–27.

② Matthew Connelly, “The Cold War in the *Longue Durée*: Global Migration, Public Health,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3 vols. (Cambridge, 2009), III, 466–488; Dirk Hoerder, “Migrations and Belongings: A *Longue-Durée* Perspective”, in Emily S. Rosenberg, ed., *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Cambridge, Mass., 2012), 444–467; Julia Clancy-Smith, “From Sidi Bou Zid to Sidi Bou Said: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to the Tunisian Revolutions”, in Mark L. Haas and David W. Lesch, eds., *The Arab Spring: Change and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2013), 13–34; Alexander A. Bauer and Owen P. Doonan, “Fluid Histories: Culture, Community, and the *Longue Durée* of the Black Sea World”, in Ruxandra Ivan, ed., *New Regionalism or No Regionalism?: Emerging Regionalism in the Black Sea Area* (Farnham, 2012), 13–30; Laurence Lux-Sterritt and Carmen M. Mangion, “Gender, Catholicism and Women’s Spirituality over the *Longue Durée*”, in Lux-Sterritt and Mangion, eds., *Gender, Catholicism and Spirituality: Wome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Britain and Europe, 1200–1900* (Basingstoke, 2011), 1–18; Suzanne L. Marchand, “Orientalism and the *Longue Durée*”, in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2009), 1–52; William M. Johnston, *Visionen der langen Dauer Österreichs* (Vienna, 2009).



类历史“形态”以及许多针对广大读者的类似宏大主题。^①

确实，“大”跨越一系列新复兴的历史写作模式回归了。其中最为宏大的是“大历史”，论述从过去一直延伸到宇宙起源本身的历史。^②“深度历史”仅包含人类的过去，叙述范围更为适中，但仍旧十分广泛；它跨越了大约40000年，并且刻意突破了“历史”和“史前”之间根深蒂固的界限。^③范围更为集中且可能与当前关注最能产生直接共鸣的是人类世的历史，即200年来（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构成一个强大到可以影响全球环境的集体行为体的历史。^④这些动向的时间范围分别是宇宙学的、考古学的和气候学的：它们都显示了历史视野的新扩展；并且对视野的影响长于——通常十分长于——一代人、人的一生，或是其他定义近期历史写作的粗略的自然时间跨度。

近五年来，图书馆的大规模数字化项目和在线的大规模口述史的到来宣告了一个更易获取大量文献资料的年代。再加上建设性的使用抽象化知识的工具——如谷歌 N-gram, wordle 和 Paper Machines——这些数字化工具使得学者开始不时地尝试跨越上百年的历史假设。可利用的工具的本质和丰富的文本使得长时段历史同时还有档案的历史成为一个可以克服的问题。在法律史或其他形式的制度史方面，对先例的重视赋予长时段的回答

① Joyce E. Chaplin, *Round About the Earth: Circumnavigation from Magellan to Orbit* (New York, 2012); Diarmaid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don, 2009); Ben Kiernan, *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New Haven, 2007); Max Boot, *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2012); 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New York, 2010); Morri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rinceton, 2013).

②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new edn. (Berkeley, 2011).

③ Andrew Shryock and Daniel Lord Smail, eds.,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 (Berkeley, 2011); Smail and Shryock, "History and the P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 3 (June, 2013): 709 - 737.

④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 2 (January, 2009): 197 - 222;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New Literary History* 43, 1 (2012): 1 - 18; W. Steffen, J. Grinevald, P. Crutzen, and J. R. 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69, 1938 (January 31, 2011): 842 - 867; Fredrik Albritton Jonss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4, 3 (September, 2012): 679 - 696.



一种特有的力量，或许我们应该尽早开始更多地考察这种作品。新工具扩展了单个历史学家综合如此庞大的信息的能力，使其有机会把握早已在历史学科某处存在的道德冲动，即一种检验可能出现的关于管理长时段的对话的范围。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已经发现数字方法迫使他们回答更长时间范围内的问题：比如，科林·怀尔德（Colin Wilder）的“文学共和国”项目，通过将早期现代的法律文本电子化，并将基于文本的信息链接到一个法律教师和学生的巨大社交网络地图中，以展示驱动了早期现代德国（即有关公有领域、私人财产和共同性等思想出现的地方）法律改革的人们。^①

面对着两个学术前沿：一是道德责任，一是技术机遇，历史学家们需要开始开展对话并讨论以百年而不是十年为单位进行思考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强调特定的数字技巧及其在与研究生教育相符的历史分期问题上的应用。我们需要树立跨时段历史的新典型和新理论，以期理解何以构成对新纪元意义的有说服力且有意义的探询。这将基于对处理了长时段问题的分支学科中成功熟练管理的构成的理解、对大与小之间抽象关系的理解，以及最终对有助于综合过程的各种工具的了解。

伴随着这些机遇和挑战，近来长时段的回归作为环境参与的关键承受着检验。长时段历史主要吸引了有环境意识的历史学家。长时段的环境史并不是受到电子文献技术的强迫而承担物种生物学的问题。数字历史反而提供了更多理解现代制度改革的机会，也正是“人类世”理论信徒所错过的机会。历史学家如斯迈尔和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援引长时段来分析回归人类世过程中污染和环境破坏与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变化的主体之间的关系。^②从托尼和芒福德传统长时段著作的长期视角来看，间接的目的是加入与生物学系的对话，而非历史学传统的与负责环境治理的决策者和政治活动家直接交流的能力。关于物种生物学的长时段历史，较之更为紧迫的记忆问题，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旁落的道德意图，例如呼吁国家创造和毁灭陆地和水上公共财产的权力。

叙事范围变得更为宏大，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得到及分析“大”数据以及我们应当在此数据上进行长期还是短期考察这一迫切问题。在历史上

①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olinwilder/>, accessed May 31, 2013.

② Guldi, “Digital Methods and the *Longue Durée*”.



有这样的时刻，这一决定——是否考察广泛的文本——使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回答这一问题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地决定了我们使用何种数据以及如何利用它，这也是长时段研究有待迎接的挑战。长时段结构赋予的力量，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且能够打开关于社会变革及其潜能与限制的对话。我们不当错误地将长时段简单地缩减到生物问题，或希望以此引起从事自然科学的同事的注意。

长时段历史的道德地位创造了使更多的人成为历史学家所写作的关于全人类的经历——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问题、治理、资本主义、开发以及心理学的受众的可能性。当有必要说服人们关注人类与地球（尤其是大气、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长期关系时，长时段历史无疑被用于暗示人类世理论。但是这可能同样也会使我们关注关于资本主义遗存走向非正义的长期斗争，正如托尼和芒福德所做的；或是关注环境治理，如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及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近期从事的研究。^①

在长时段工具时代，当跨世纪考察成为每个研究生都能使用的一种工具时，关于历史长期考察的应用及合适受众的对话也正在成为每个历史学系构造的一部分。我们不当将对话限制在单纯的人类世或全然讨论马克思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从这两种思想中吸取乌托邦式的抱负是十分明智的，同样，迎回一种历史写作关键方法也是十分明智的，这也亟须重塑公共话语和调整政策的勇气。

长时段的回归与变化中的规模问题密切联系。在不平等日益加重的时期，在全球治理的危机中，以及在人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下，即使对塑造我们生活的条件进行极少的了解也需要调查范围的扩大。长时段带着新目标、新外观回归了，但它仍旧要求我们回答最为基本的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如何选择论题的界限，以及解决这一问题要使用何种工具。记忆的力量能够使我们重新拾起早已遗忘的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去说服、重建及激励的力量。文艺复兴史学家康斯坦丁·发索尔德（Constantin Fasolt）认为，对早期现代的民间机构的思考主要基于一种他称之为“历史反叛”的

^① Den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1985); John R. Gillis, *Islands of the Mind: How the Human Imagination Created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2004).



态度。^① 鉴于这一点，研究长时段的新历史学家应当勇于使用历史来批判我们周围的机构。^② 历史可以为抛弃仅仅基于长寿而存在的过事物提供基础。带着历史——但仅是历史的长时段——去思考，可能帮助我们选择哪些制度应当被埋葬，哪些我们可能希望保留。

① Constantin Fasolt, *The Limits of History* (Chicago, 2004), 19.

② 对照 David Armitage, *Civil War: A History in Ideas from Rome to the Present* (forthcoming); Jo Guldi, *The Long Land War: A Global History of Land Reform, c. 1860 – Present* (forthcoming)。



ginning of the universe) instead of from religious sources. While most of the cosmos is inanimate, very soo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life the first traces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can be detected. Throughout evolution, and also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cooperation has come as a result of efforts to survive the struggle for life, which includes competing with other species. As a consequence, both moral and competitive behavior are rooted in our genes, but both types of behavior can be mold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by learned, cultural behavior, thanks to the large neocortex that is unique for humans.

Keywords: Moral behavior; religion; big history; biological evolution; struggle for life; competition; genes; brain development; culture; collective learning

Non-linear Future and the Problem of Life Meaning

Akop P. Nazarety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estimates, Earth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go through polyfurcation that might be comparable, in its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to the emergence of life. What scenarios are possible, and what factors do further developments depend on? The author answers these questions using synergetic models, as well as data from modern cosm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Keywords: Universal history; complexity; polyfurcation; attractors; consciousness; meaning; ideology; regulation; life; death; immortality

The Return of the Longue Durée

David Armitage (Harvard University) &

Jo Guldi (Brow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most historians have worked on biological time-scales of between five and fifty years. This narrow focus represented a retreat from the longer periods historians had generally covered befor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served to cut them off from wider reading publics and to deprive them of the influence they had once had on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aus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retreat and proposes a solution for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and of relevance, it has created. A return to what Fernand Braudel had classically termed the *longue durée* is now both imperative and feasible: imperative, in order to restore history's place as a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and feasible due to the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digital tools necessary to analyse it.

Keywords: *longue durée*; Braudel; Annales; historiography; digital history; micro-history; Big History

The War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rry H. Rodrigu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 Lewiston, Maine, USA

Abstract: The inclusion of large-scale studies in the world's educational system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resolving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s that humans face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macro-historical studies began with course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undred years ago. Global studies came to be increasingly offered in universitie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volved in two directions. The first developed into Globalization Studies, a hierarchical model that was discipline-based and focused on power-relationships in regions and markets. The second was a "mondialisation" or horizontal model, which was interdisciplinary and used the entire world as a reference point. Similar academic models also came into existence around the world that paralleled this U. S. experience in macro-history. A problem that today's scholars face is how to reconcile these two visions, not only for global benefit but for our very own survival. One suggestion is to continue moving with the current trajectory and to adopt a model of macro-studies, such as the example provided by *Big History*.

Keywords: war of history; macro-studies; globalization; global studies; big history